



人大重阳
RDCY

金融研究简报

第五十六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5 年 2 月 4 日

中国崛起的最大风险来自内部

——人大重阳思想沙龙“国家崛起与潜在风险的防范”会议纪要

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有责任的大国作用，不仅在经济上实现了国家崛起，而且在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中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模式是目前全球最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结合目前的新常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经济能否平稳健康发展，社会能否稳定，以及潜在风险都有哪些？如何前瞻性地提出防范的

建议措施？2015年1月26日，人大重阳第20期思想沙龙邀请国内外诸位专家学者，就此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不要走美国老路

柯伟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的崛起，不光持续了10年、20年，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历时一百多年了。中国崛起是以民国时期的“民族复兴”为基础，延续至今形成了目前的崛起甚至强大。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达到了它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存在恐怖主义的时代，中国却没有敌人，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1979年至今，中国更加开放，也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这为中国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一些媒体称中国现在面临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挑战，但从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来看，很难去发现这些危险是什么，也许这些挑战是来自国家内部。

在我看来，美国在今天仍有很多优势，但也有很多薄弱的地方。美国这届政府上台之初做了很多承诺，但很难去一一实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遭受了很多灾难，自然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影响十分严重。但是对美国来说，真正的灾难是摧毁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国家繁荣的信心。

所以，美国有大问题等着去解决，中国也有。美国的问题包括世界和国家两个方面的，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国家内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基本上决定了这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很关注。美国人觉得他们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人知道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困难的是，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看到的東西，

却看不到别人看到的東西。因此，我通常對我的學生說，他們看到的中國歷史是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歷史，而不是中國人看到的中國歷史。當然我們也希望在美國的歷史中出現中國式的看法觀點。

中國領導人偉大而富有遠見的籌劃能力令人驚訝。中國夢是區別於美國夢的很好定義，每個人都能夠定義屬於他們自己的夢想。

徐輝（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副院長）：首先，現如今很難去分辨什麼問題是國內的問題，什麼問題是國際的問題，因為這兩者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每屆領導人在治理國家時都有他自己的方法和規則，當人們在討論中國面臨的危險時，習近平總書記的觀點是繼續走出去。那麼在你看來，這是中國的危機、挑戰、還是機遇？

柯偉林：首先，在全球化的力量下，中國吸引了來自全球的投资，同時中國也積極向西方國家投資。說到危險，我覺得首先中國應該不要走美國的老路。美國投資的成功與其軍事力量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繫。美國商業的成功伴隨著軍事上的擴張，使得美國在任何地方都有很高的軍費開支，但是最後的結果證明，這些開支也許根本就不值得的。兩年前，美國轟炸了利比亞，原因只是因為美國要證明自己能夠做到，而轟炸利比亞的武器費用可以用來進行很多經濟建設了。

中國崛起的“四特”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在大的層面上，從橫向比較來看，我把中國崛起稱為“四特”：第一是中國的特长歷史，五千年文明從來沒有中斷過。

第二是崛起的特大规模，13 亿人的全球化。这是人类现代化、工业化或是信息化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规模，所以以前的一些发展模式、经验都难以用来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第三是特“俗”的崛起，关系世俗问题。历史上的大国要么信仰伊斯兰教，要么信仰基督教，但是中国人基本没有单一宗教信仰。权力怎么受约束，能不能维持庞大的社会稳定、持续发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的软实力。

第四是特殊的崛起。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六七十，但是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 1/8，这是在其它国家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当年日本、苏联、德国追赶美国的时候，总量上达到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时，人均也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很可怕，这使得国际社会和美国都没有做好接受中国的准备。

再纵向比较，看五千年中国的发展：

第一，它可能不是一种崛起，而是文明的转型、复兴，但是它又不光是复兴。历史上中国的 GDP 也曾达到过世界领先国家的 30%、40%，但当时是小农经济，而现在是一种大进大出的开放型经济，中国近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28%，超过美国 10 个百分点，成为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国，这对世界话语权有很大的影响。

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三种文明的转型。一是从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化的信息文明；二是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现在的“一带一路”也是陆海兼备的文明；三是从地域性文明走向全球性的文明。

第二，从时间段来看，中国进入现代化改革开放 35 年来取得的成就，达到了其他国家经过几百年才达到的水平。我们传统的国家架构和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都难以包容这些剧烈的变化。

第三，国家建设还没有完成，甚至国家统一还没有实现，现在要快速复兴，甚至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都是挑战。从当前风险来看，最大的风险是“中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最显著的国际政治现象，但是世界和中国都没有做好准备”。中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全世界都认为你在撒谎，这个事情就是很特殊的现象。美国代表西方霸权，或者是一种海洋霸权，它是一种霸权现象，而不光是一个国家，所以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跟世界体系现存秩序的关系。

最大风险在于中国政策的制定出现失误

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我觉得中国的风险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风险和相应的政治风险，且现在看起来情况比较严重了。

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在现在的土地制度下，房地产泡沫不可避免且非常坚硬，但泡沫都是要破的。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正在倒塌，最后一定会影响到一线二线城市，所以经济形势非常不好。经济形势不好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政治体系来做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比如金融改革。但现在每个部委都在提自己的改革方案，却根本没有关注改革的有效性，而很多改革还会相互制约，由此带来新的问题。

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改革没有形成合理的路径，进展不理想，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带来巨大的金融、经济风险，甚至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说起中国发展中要遇到的风险，最大风险在于中国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如果出现失误，

这个崛起很可能会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现在很多问题都是顶层设计的问题造成的，像房地产泡沫、城镇化过快、农业问题，甚至社会道德等问题都不是老百姓造成的，而是顶层设计在政策执行当中产生了巨大偏差，最后导致现在发展过程当中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顶层设计要规范化，要受到约束。

刘仰（知名学者、《中国不高兴》等书作者）：讲到崛起的风险，无非就是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从国外来说，世界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会不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或者伤害，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世界是不是准备好中国的崛起，中国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最大的风险，还是像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罗思义先生说的那样，“今天的中国不会被谋杀，只有可能被骗自杀”。换句话说，外部风险没有那么大，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在内部。那这样巨大的风险究竟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中国的领导集团那里，或者说中国的精英集团、知识分子集团，中国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在这儿。

冯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中国面临的威胁，一定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中国要遭受威胁的时候，往往先是内部出了问题，比如地方势力比较强大，导致中国内部不稳定，出现动荡、分裂。但是今天的中国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呢？很可能来自指导思想，来自顶层设计，很可能是上层的宏观决策出问题。如果这个出问题了，这对中国的威胁是最大的。而顶层的决策很多来自下面。中国是部长领导下的处长管理体制，这就反映了一方面的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层面：第一是上层的想法，第二是谁给上层提供这些报告形成这些想法。

方兴东（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已经不是技术和产业的概念了，它是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就是网络空间时代的国家治理和外交到底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政府目前有关互联网的决策还停留在技术部门，或者是内容、舆论部分，所以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互联网战略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但是部委以下还是没有将互联网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所以做的很多事情不符合发展需要，这有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消极反应的战略，这跟我们的实力和发展需要是完全不相称的。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在崛起进程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大家都说在内部，那内部的要害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政治自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风险。

第一，从孙中山，到共产党成立，再到井冈山，这是一个政治自觉过程。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农村保卫城市的道路成功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政治自觉，它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调动全体中国人努力，来实现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三反”、“五反”，升级改造，到文化大革命、到“大跃进”，中国又一次探索如何富国、强兵、富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政治自觉，带来了中国这30年的发展。

第三，现在我们产业结构面临调整，中外关系面临转型，中国是转型的中国，面临第三次政治自觉。

中美之间的政治趋同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探讨中国崛起的潜

在风险，我个人感觉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第一，怎样维系高层的团结。

第二，需要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在国家的财政还是有问题的，高房价、高地方债、高企业债，随着刺激政策的有效性递减，如何持续如此高的支撑，这很重要。

第三，美国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兑现几任总统说过的欢迎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美国目前不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这实际上是某一些集团、势力被利益驱动所为。这次李克强总理讲话说，21 世纪是和平的世纪，发展的世纪，创新的世纪，那么在此情况下美国是否愿意跟中国和平共处？

我再补充说一下中美之间的政治趋同性。过去一百多年，中美之间的政治越来越趋同，向一个方向走。

第一，美国的政治越来越精英化，而中国也是在进行这样的精英化过程。

第二，地方权力。美国地方权力也很大，地方独霸势力比中国更强，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权力肯定要大于中国地方市委书记的权力。地方政府现在除了没有国防的权力之外，其他的权力都有，这样容易产生地方腐败。

第三，反腐败。中国有中纪委，但美国没有纪委。美国的军队我不知道有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美国自二战以来，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一例将军因为腐败出局的案例，这不符合常识。再清廉的政府、清廉的军队难道没有一个将军可能腐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就像债务市场没有一例违约一样，这都是有问题的。

第四，随着互联网的产生，个人的权利无限制的被扩大，美国也是这样。双方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就是如何治理一个互联网化、民主化和后现代化的国家，中美之间需要共同努力。

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给编辑部（电话 010-62516305）
责任编辑：胡海滨 蒋黎黎 审核：王文

分送：中央相关机构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
各金融机构负责同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官方网站：rdcy-sf.ruc.edu.cn

邮箱：rdcy-info@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公众微信号：rdcy2013